

大难不死侥幸系“天”

陈鹏年诗案

雪艇松龕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如。
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
雨后万松全逖匿，云中双塔半迷离。
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
尘鞅删除半晌间，青鞋布袜也看山。
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
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
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

这是前清康熙年间颇负盛名的高士和廉吏陈鹏年的一首七律，题为《重游虎丘》，描写了苏州幽雅绮丽的景色。因是故地复履，所以诗中不免有几多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未脱文人墨客借景抒怀的旧习。但就是这么一首极普通的七律，竟被人诬陷为“心蓄异志，语涉大逆”，险些成了一起文字冤狱的牺牲品！清代文网之严酷与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深为清帝赏识的名士和廉吏

陈鹏年，号沧州，字北溟，湖南湘潭人。康熙 30 年（1691 年）进士。其祖在南明隆武朝时由副贡被荐至江西巡抚，明亡后为僧，其父也是前朝旧人。他的先辈擅长诗词，尤善哀怨之吟。陈鹏年幼时从学，才华横溢，诸子百家无不研究，也笃好诗，音声流露，时有凄楚悲凉之感。著有《沧州诗集》39 卷，后又续刻《道荣堂诗集》10 卷，《文集》6 卷。在文人圈内是一位声名甚佳的高士，倍受推崇。

陈鹏年为人清高耿直，是前清官衙中少有的从不谄媚，亦不

贪污的廉吏。初任浙江省西安知县，政声蜚然。康熙 40 年（1701 年），河总张鹏翮荐其才能敏练，调赴江南河工。次年授山阳知县，迁海州知州。康熙 42 年（1703 年），清帝四次南巡，适山东灾荒，令急调漕米四万石运赴赈济。张鹏翮荐陈鹏年负责，顺利完成任务，救活了数万人，得到康熙的赏识，专门在御舟召见他并赋诗题字相赠。第二年便提升他为江宁知府。

见罪于阿山，冤狱初起

康熙 44 年（1705 年）正月，清帝第五次南巡。行前，皇帝照从前几次南巡惯例，向吏、户、兵、工等部门及地方宣布：“往返皆用舟楫，所至勿修缮行宫。凡有借此科派勒索百姓者，皆以军法治罪。”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贯彻此意。

江南江西总督阿山，为筹办皇帝南巡费用，并欲借此大捞一把，即召集属下官员商议，提出给百姓派捐。众属唯诺，独陈鹏年反对。他说：皇帝出巡，根据朝廷规定，一切费用全部由国库支用，不准动用地方财物。我辈私自摊派，“事若上闻，吃罪滋大。”事遂不成，阿山因此亏欠不少银两，故迁怒陈鹏年，非设法将他整下去不可。恰好康熙的车驾要经龙潭赴江宁，阿山故意命他去修缮皇帝歇息的龙潭行宫。因经费无着，陈鹏年简单整饰一番，并拒绝给侍卫、太监等人员送礼。这些人想加害于他，便在行宫准备皇帝坐垫的竹席上撒放蚯蚓粪。皇太子胤祁先至行宫，见如此模样，视为大不敬，勃然大怒，欲杀陈鹏年。康熙虽知他有难处，但也觉得他对皇上这种态度，实在让人不快。到江宁后，住在江宁织造曹寅府第。一日，曹寅的幼子连生在院子玩，康熙随便问之：“儿知江宁有好官乎？”连生对答：“知有陈鹏年。”这小孩的回答引起康熙的注意，陈鹏年为何有如此影响？抑是曹寅和他同党，故意哄骗皇上？他心里疑惑不解。恰好退休在乡的原大学士张英来叩见，帝便问江南哪个是廉吏？张英举出陈鹏年。帝问他居官如何？张英答：“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

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未也。”康熙听罢，这才把对陈鹏年的气消下去，并且对皇太子胤祁说：你的师傅张英还称赞他，怎么能杀他呢？胤祁仍坚持己见，曹寅为陈请命，免冠叩头，碰阶有声，血流满面。康熙知曹与陈素不相交，曹是重陈廉而为之叩请的，此事算了结。

但阿山并未就此作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当时康熙欲于京口检阅江宁水师，需要在江边以石垒一检阅台，阿山等到临检阅的前日，方才下令陈鹏年督造。可江流湍急，工役惊恐，施工十分困难。若耽搁第二天检阅，陈鹏年不被砍头也得丢官。然后陈鹏年身先士卒，率士民亲运土石，一直苦战至次日凌晨，检阅台屹立江边，他才得以幸免。

44 年 6 月，直欲将陈鹏年置于死地的阿山上疏弹劾陈鹏年擅收盐商、当铺年规，贪污龙江关税银，且无故捉拿关役，重责枷号，将陈鹏年解职下江宁监狱。朝廷命漕总桑额、河总张鹏翮与阿山会审，结果所控各项均非事实。于是，阿山又耍阴谋，劾陈鹏年将原妓院旧址南市楼改建为乡约讲堂，作为每月初一宣讲圣谕的场所，并挂“天语丁宁”匾额。从而告以大不敬罪。至是狱成，刑部拟论斩首。审判定案送上，时康熙正与大学士李光地议论阿山的政绩。李光地说：“阿山任事干练，唯独劾陈鹏年事受舆论非议。”康熙点头称是，下诏将陈鹏年革职，从宽免死。把他调离阿山手下，命赴京入武英殿修书。

但不久康熙又改变主意，认为陈鹏年这样不可多得的一员廉吏，在京修书对治理地方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46 年（1707 年）因阿山主义另开河工失策，革去总督职，第二年命陈鹏年为苏州知府。陈到任两年，改革奢侈陋俗，清理冤假错案，抗灾治疫，赈济贷借，使地方大有起色。故 48 年（1709 年）署江苏布政使。无独有偶，偏偏新来的江南江西总督噶礼，又是陈鹏年的克星。

不容于噶礼,再兴诗祸

噶礼，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他凭借母亲是康熙皇帝的乳娘，抚摇直上。康熙 38 年授山西巡抚，在晋为官近十年，贪赃枉法，对上方谄媚吹捧，报喜不报忧；对下扶植党羽，飞扬跋扈，纵吏虐民。像噶礼这样的人，反倒官运亨通，康熙 48 年迁户部侍郎，不久就放任江南江西总督了。前任阿山和现任噶礼，都是太子党的重要成员，噶礼知道陈鹏年与阿山的旧怨，当然也就不会放过他。初次见面，就想给陈一个下马威。因议事时陈不长跪，噶礼怒叱道：“你陈某人耶！人言你倔强，你可知你的性命在我手里。我欲知府生死甚容易，就好象用手扞虱子一样。”陈鹏年从容答道：“不对，知府若上欺朝廷，下毒百姓，则有法典在。若他奉公守法，皇上无旨杀他，百姓对他无怨言，虽区区一小官，想杀便杀，以此耍威风，没那么容易！”说完缓步而出，把噶礼气得七窍生烟。

就在这一年，福建巡抚张伯行调任江南巡抚，他了解陈鹏年的为人，十分器重他，遇事总和他商量，且多采纳他的意见。而张伯行对噶礼的专横跋扈深为不满，常与之相梗，两人的矛盾很深。噶礼认为张的不少主意出自陈鹏年，于是对他更为憎恨。康熙 49 年，噶礼弹劾布政司宜思恭亏欠库银，粮道贾朴贪污建关与开河银项，乘机告陈鹏年核报不实。吏部议革陈鹏年职，充军黑龙江。康熙洞悉噶礼与张伯行矛盾事，没有同意吏部拟议，再一次命他来京修书。

但是，噶礼怎肯善罢甘休，因为陈鹏年还是个诗人，诗容易发泄牢骚，流露哀怨和不满，于是从陈鹏年的诗卷中，找出了一首七律《重游虎丘》，上奏弹劾陈鹏年写诗讥刺朝廷“心蓄异志，语涉大逆。”噶礼按诗句旁注，认为“代谢已怜金气尽”中之“金”字，暗指满洲入关前国号（实际上，“金气”系指金黄色的秋天）；“一任鸥盟数往还”中之“鸥盟”二字，乃阴通台湾郑氏

集团之明证。同时将陈鹏年锁拿下狱。

由于噶礼蓄意制造的这起文字狱，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痕迹过重，劾疏上闻后，康熙对噶礼所为也深为不满。康熙对朝内外满汉大臣以及诸皇子等各树朋党，窃弄权柄，相互倾害之恶劣风气一向忌恨，尤其噶礼，不学无术，亦借诗祸来排斥异己，任意歪曲诗意，笑话百出，更使皇帝难堪。所以康熙明确表态：“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人人命。”对噶礼企图挑起的文狱不予理睬。

皇上说了句“公道话”

康熙 51 年（1712 年）正月，因江南科场案发，巡抚张伯行疏劾总督噶礼欲索贿五十万两，保证结案完事。噶礼又疏劾张伯行通贼、循私、诋上等七大罪，两个俱解任在扬州受审，出现了江南督抚两大臣互相讦告的一大新闻。对此，康熙甚感头痛。最后，他采取了抑噶扬张的处置办法。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牵涉到陈鹏年的问题，康熙说了句“公道话”：“至陈鹏年稍的声誉，学问也优。噶礼欲害之也久矣。张伯行听信陈鹏年之言，是以噶礼与之不和，曾将陈鹏年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于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鸥盟二字，不过托意渔樵。陈鹏年诗见在，非无据者。今与尔等共看，可知朕心之公矣。”这算是为陈鹏年诗案平了反，当然也为自己赢得了“圣明”的名声。

康熙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

康熙 61 年（1722 年）11 月 13 日晚，康熙皇帝死于北京西郊畅春园。20 日，雍亲王胤禛登基即位，这就是大清第 3 代皇帝雍正。200 多年来，人们对胤禛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颇有怀疑，这与康熙突然死亡有关。关于康熙之死，历来就有病死和被毒死

两种说法。康熙究竟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至今还是个谜。

从史料上看，关于康熙之死，有两种记载。王先谦在《东华录》中说：康熙 61 年（1722 年）10 月 21 日，康熙到南苑行围。11 月初七日，身体不适，从南苑回驻畅春园，13 日病情加剧，命速召皇四子胤禛，又召皇三子……皇十三子和理藩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嘱咐：“皇四子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不久康熙晏驾，胤禛即位。以上记载说明康熙是病死的，属正常死亡。胤禛即位也是合法的。

在雍正朝的文献《大义觉迷录》中，湖南人曾静的供词中说：“对祖皇帝（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雍正）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曾静直指胤禛是毒死康熙的凶手。另外在《永宪录》中有康熙病危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的记载。把念珠当作康熙传位的信物，以此来说明胤禛即位的合法性。而在《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与此完全不同的记载：说康熙在垂危之际，众多皇子都不在身边，只有胤禛一人随侍在侧，老皇帝从昏迷中苏醒，他想宣召朝廷重臣入宫托咐后事，可是没有一人前来，心知有变，气恼之下，取下手腕上一串玉念珠朝胤禛掷去，没有击中，胤禛假意跪下谢罪。不久深宫传出老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同一念珠，在这里由传位信物变成了泄怒的“武器”。如真是如此，康熙就根本不可能传位于胤禛，胤禛的即位也就大可怀疑了。

史学界对康熙之死，历来众说不一，近几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被胤禛和隆科多毒死的。胤禛和隆科多为什么要毒死康熙呢？这是与胤禛争夺帝位分不开的。康熙 51 年（1712 年）皇太子允礽再次被黜后，皇太子位一直空着，诸皇子之间明争、暗斗，争位斗争十分激烈。从当时情况来看，不论那位皇子当上皇太子，必然会受到其他皇子的强烈反对。因此，康熙想培养一位使群臣“倾心悦服”的皇子为皇太子，并为

此作积极的准备。康熙 57 年（1718 年）9 月西征失败后，康熙决定再次西征，于当年 10 月，任命皇十四子允禔为抚远大将军，前往青海主持前线军务，全力准备入藏西征。抚远大将军这一职务是当时诸皇子争夺继承权逐鹿的对象，最后大任落在皇十四子允禔的肩上，包括胤禩在内的其他皇子都落选了，这是康熙就皇位继承人问题所作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暗示。康熙意在西征中树立允禔的威信。允提出征后，康熙曾盛赞允禔“确系良将”。康熙 59 年（1720 年）8 月，西征取得重大胜利，允禔作为统帅，建立了出色的功勋，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胤禩一方面在西征前线安插自己的代理人年羹尧，另一方面在北京利用步兵统领隆科多在一等公爵承袭问题上对康熙的不满，拉拢隆科多，使之成为自己的亲信，在即位斗争中为自己效力。

康熙 61 年（1722 年）初，清朝与准噶尔统治集团进行和谈，10 月准噶尔使团前往北京议和。允禔将以胜利的统帅凯旋回朝，允禔在诸皇子和群臣中的威望大大提高，允禔即位已成定局，康熙建嗣计划基本完成。当时康熙正在北京南苑行围，11 月初七日因患轻感冒回畅春园休息，经服药后，感冒基本痊愈。初十至十五日，康熙在畅春园“静养斋戒”，不处理政务，不召见官员，皇子们也都不在身边。文武大臣也不敢去打搅。实际上与外界隔绝，由保卫京师的步兵统领隆科多负责他的安全。胤禩就利用这个大好机会，采取了断然手段，于 11 月 12 日晚，隆科多把毒药放在食品中，使康熙突然病危，不省人事。事后隆科多一面封锁消息；一面迅速通知胤禩，并假传康熙旨意，召见在京其他皇子。13 日早上，皇子们相继赶到，参加“抢救”，但是他们都暂时失去了离开的自由。畅春园一带早被隆科多的部队封锁了。胤禩直到当天中午才不慌不忙来到畅春园。康熙从突然病发到死亡，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并没有也不可能指定皇位继承人。而就在这时，隆科多向诸皇子宣布了康熙传位给胤禩的所谓遗

诏，立即引起了诸皇子的强烈反应。由于当时不仅畅春园，而且城郊内外都由隆科多的部队控制，早已戒备森严，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了，诸皇子也不得不承认现实，胤禩终于取得了皇位。

康熙死后，在严密警卫下，胤禩护送康熙遗体回城。隆科多负责宫廷的保卫事宜，不经他的许可，皇子们都不得入宫。据说当时北京城门关闭了六天。

持此说者认为，康熙 61 年 11 月 13 日发生的事件，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巧妙安排的宫廷政变。康熙是被毒死无疑。

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病死的，属正常死亡。持此说者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了诸皇子的情况后认为：当时胤禩和允禔是皇太子的候选人。虽然康熙传位给胤禩，没有留下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从康熙生前对胤禩的信任和康熙晚年宠爱胤禩之子乾隆的情况看，康熙传位胤禩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允禔远在数千里之外，下诏回京也需一个月左右。国不可一日无君，尤其是在诸皇子争位激烈的情况下，必将天下大乱。因此，康熙想传位给允禔也不可能了。所以，从当时情况来看，康熙传位胤禩比传位允禔的可能性要大些。

胤禩在位时，社会上盛传“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一向怕被害，他把“考终命”（老死）列于五福之一。他要想“考终命”，就不得不有所提防，所以要害他也不易。病人喝人参汤是当时人们的习惯，但康熙不爱喝人参汤，他曾说：“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与参不合，朕以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由此可见，用人参汤毒他也不容易。

持此说者认为，康熙突然死亡是因为康熙长期有病，并越来越严重，由于感冒而引起其他病症复发而突然死亡的。所谓被毒死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以上关于康熙之死的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要揭开康熙究竟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这个谜，还需史学工作者根据有关的史料，进一步讨论、研究。

驱逐西方传教士

自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以来，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至康熙末年，各省教徒数字已达 30 万，拥有教堂、住院 300 座以上。这股外来势力终于引起了清统治者的不安。雍正元年（1723 年），雍正帝胤禛即位不久，便下令全国开始驱逐西方传教士。

雍正元年，在传教士的根据地——福建省福安县，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们欲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使男女混杂，败坏风气。知县傅植很快接到总督满保的命令，亲赴各处教堂查禁，但遭到信奉天主教的生员郭于宣等人的反抗。6 月初一，闽浙总督满保下令捕拿郭于宣等人，将传教士驱往澳门，无论其有无朝廷过去发给的传教信票。8 月初八，福建省巡抚黄国材又与总督联名告示全省，指出省内各处教堂均在查禁之列。

10 月 24 日，满保将福建禁教情况具题本上报，并请诏令在全国禁教：“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雍正帝下令将题本发礼部会议复奏。12 月 8 日，礼部官员开始会议满保题本。主持礼部的康熙十二皇子允禩因与教士过从较密，企图提出另一个折衷方案，但由于有关官员向他暗示禁教是雍正帝的旨意，只得放弃。几天后礼部复议：“应照该督所请，除奉旨留京效力者外”，其余起盖的天主教堂俱改为会馆。12 月 16 日，雍正帝下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着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

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至此，清廷正式诏令在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造成西方传教士被驱逐的原因十分复杂。首先，一些传教士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禩，直接导致了雍正帝的报复行动。其次，这场禁教运动又是始于康熙后期的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继续。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帝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雍正帝即位后，又把范围缩小到只准少量教士在北京活动。最后，基督教宣传的人人平等形式被民间一些秘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如号召建立西洋理想国度等，也引起了清廷的恐惧。

雍正帝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决定上奏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在钦天监任职的传教士戴进贤于雍正2年（1724年）5月11日奏上一折，辩解天主教入华“守法焚修，原非左道”，请求允许各省教士在广东居住。雍正帝在朱批中予以严厉驳斥，指出驱逐一事“旨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其后，又召见传教士戴进贤、巴多明、白晋，当面训谕：“朕若派僧道喇嘛赴西洋传教，尔等何以待之？”“尔等若以欺蒙皇考得逞，毋望复能欺朕！”然而，他终于应允了传教士暂留广东的请求。10月29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准，暂令传教士在广州天主堂居谿，不许传教，也不许百姓入教。

在此之前，各省官员已掀起了驱逐教士的浪潮。直隶、广西、山西、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的教堂被查封，改为书院、祠堂、育婴堂或谷仓等公所。各省教士开始向广东押送，途中遭到民众的斥骂和投打。押至广东的教士，有耶稣会士37人，方济各会士13人及多明我会士数人。他们最终仍难逃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雍正7年（1729年）闰7月25日，军机处再次字寄各省，“近闻外省府县中竟尚有潜居住”的教士密行传教，应再行清点

驱逐。结果将江南、浙江省原称年老养病的毕登荣等传教士驱往澳门。雍正 10 年（1732 年）6 月，广东总督鄂弥达得旨，将雍正 2 年（1724 年）允住广州的 35 名教士驱往澳门，解散广东教会。戴进贤在京再次上奏乞留。雍正 11 年（1733 年）2 月 3 日，雍正帝召见在京教士，严词斥责道：“彼寄居广州被逐出境，乃理之当然，又何词之有。即汝辈在京亦岂能入居耶！”此后，公开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仅留北京的戴进贤等 20 余人，以修历为职，不得再行传教。

雍正帝驱逐西方传教士的措施在鸦片战争前一直被历朝统治者承袭，成为清廷对外的一项基本政策。这种不分良莠一概驱逐的做法，客观上加剧了清朝社会对外一无所知的闭塞状态。

平定罗卜藏丹津

青海和硕特蒙古是顾实汗在 1636 年击败却图汗后自乌鲁木齐地区移牧过去的。后来，顾实汗虽然底定西藏，但青海仍为其根据地。顺治 6 年（1649 年），清政府分别赐给协助清军作战有功的顾实汗第二子鄂木布、第七子瑚噜木什以“土谢图巴图尔岱青”、“巴图尔额尔德尼岱青”的称号，以示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笼络。顾实汗死后，其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纷争，并不断率番众掠内地，抗拒清兵，使清廷深为头痛。康熙 36 年（1697 年），康熙派额驸阿喇布坦到青海召谕和硕特部领袖人物归附。阿喇布坦与顾实汗当时仅存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召集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号召诸台吉归附清朝中央政府。此后，达什巴图尔又率青海诸台吉到北京入觐，康熙帝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对其余诸台吉则赐以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辅国公等爵位。至此，青海和硕特蒙古虽然被清朝招抚，但地方割据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康熙 44 年（1705 年），在西藏的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执杀

其政敌第巴桑结嘉措，废黜达赖六世仓央嘉措，另立伊希嘉措为达赖六世。这件事为清政府所支持，却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一些领袖人物的强烈不满。康熙 53 年（1714 年），达什巴图尔去世，其子罗卜藏丹津袭亲王爵位，为青海和硕特部首领中爵位最高者。罗卜藏丹津等人拥立理塘出生的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当清政府下令将噶桑嘉措护送入藏坐床时，罗卜藏丹津参加了清军的这一行动。罗卜藏丹津等青海蒙古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于康熙 59 年（1720 年）春随大兵扈从达赖喇嘛入藏，军容甚盛。当时，罗卜藏丹津等人之所以如此踊跃协助清军，是因为“先经阿穆瑚郎汗（指康熙）有旨，取了土白忒国，将尔等（指青海和硕特部台吉）内中立汗。”在康熙 59 年（1720 年）秋到康熙 60 年（1721 年）春这段时间内，罗卜藏丹津曾参与管理西藏地方政府事务，然而时隔不久，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便趁机正式废除了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任命康济鼐、阿尔布巴等藏官为噶伦，共同负责西藏事务。这样，罗卜藏丹津就无权再过问西藏政务了，其再建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的美梦遂成泡影。

在罗卜藏丹津看来，和硕特汗庭统治西藏已历 18 载，驱逐准噶尔以后，恢复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作为当时唯一有亲王爵位的和硕特部首领继拉藏汗之后而成为统治西藏的汗王，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清政府当时政局稳定，势力蒸蒸日上，已经足以直接过问西藏政务了，当然不会再赐给罗卜藏丹津“汗”的封号，使之接替拉藏汗的位置统治西藏了。罗卜藏丹津等人由于在达赖七世坐床典礼上受到冷遇等原因，已经对清政府心怀不满，在佛像前发誓一定要恢复和硕特部的“霸业”。并且，清政府对青海和硕特蒙古本身也采取了“众建分治”的政策，以防其尾大不掉。雍正元年（1723 年）2 月，清政府封赏参加入藏驱逐准噶尔战争的察丹津封为亲王、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 封为郡王，从而严重削弱了罗

卜藏丹津的权力，致使罗卜藏丹津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愈加尖锐。

雍正元年 7 月，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蒙古各台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他自称“达赖浑台吉”，强令青海诸台吉都使用旧时名号，一律不许称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与亲王察罕丹津因拒绝听命于罗卜藏丹津，遂遭到罗卜藏丹津的武装进攻，寡不敌众，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得知变乱的消息后，一面命令川陕总督年羹尧前去坐镇西宁，密切注视罗卜藏丹津的动向；一面命令兵部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宣布清廷谕旨，令其罢兵和睦。罗卜藏丹津虽然对清政府怀有怨怼、忿懣之心，但尚无与清廷争雄天下的志向。然而，他进攻清廷所支持的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拘禁常寿，并且在西宁周围制造骚扰，这样便将自己置于清政府的对立面。

在罗卜藏丹津煽惑之下，青海各地喇嘛寺院的僧人起而响应叛乱。青海境内两座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湟中的塔尔寺和互助的郭隆寺都卷入了这场叛乱之中。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们汗在青海威信极高，他站到叛乱势力一边后对青海僧人影响尤大。郭隆寺是清朝有名的章嘉呼图克图的寺院，由于章嘉一世的转世灵童当时年仅七岁，所以也被该寺上层喇嘛裹胁参加了叛乱。为了不使叛乱继续蔓延，清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进行镇压，派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攻打青海地区；派平逆将军延信驻守甘州、靖逆将军富宁安驻守安西，以防罗卜藏丹津与准噶尔合兵；派总兵周瑛领兵两千进藏，以截断罗卜藏丹津逃往西藏的道路。在完成这些部署之后，清军集中优势实力逐个攻破西宁附近叛军盘据的据点和寺院。其中，清军在雍正 2 年（1724 年）正月攻打郭隆寺一役最为激烈。该寺僧人负隅顽抗，清军浴血奋战，“以兵三千，破贼万余”，将该寺院建筑全部烧毁，故而年羹尧说：“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

在西宁附近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清军便转入进攻罗卜藏丹津驻牧地的战斗阶段。年羹尧采纳岳钟琪“乘春草未生”而“捣其不备”的作战方针，于雍正 2 年 2 月 8 日分兵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这三路清兵分别是：总兵吴正安所率领的北路，总兵黄嘉林、副将宋可进所率领的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所率领的南路。20 日，清军探知罗卜藏丹津驻扎在乌兰穆和尔一带，于是岳钟琪率军连夜前去突袭，到罗卜藏丹津驻地时，叛军刚刚入睡，因清军的猝然攻击而惊慌得手足无措，纷纷抱头鼠窜。清军在这次战斗中俘获了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和妹妹，此后又在乌兰白克地方的一次战斗中俘获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等人，战果辉煌。罗卜藏丹津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走投无路，不得不携带妻妾逃往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处。乾隆 20 年（1755 年），乾隆帝派兵攻灭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当时逃到准噶尔部的罗卜藏丹津被迫向清政府投降。由于全国局势已经稳定，所以清政府将罗卜藏丹津押解到北京后并没有将其处死，只是将其软禁至死。

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后，清政府于雍正 2 年（1724 年）5 月采纳年羹尧提出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对青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在政治上，清政府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编旗设佐领，并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在经济上，清政府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各项措施，对西宁周围可耕之地实行屯垦；在宗教方面，清政府严格限定塔尔寺等寺院的规模、僧俗人数，以防成为藏污纳垢之地。青海地区从此完全被置于清朝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和硕特汗庭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年羹尧之死

雍正 3 年 12 月（1726 年 1 月），原任川陕总督，贵戚重臣

年羹尧在京城刑狱中奉旨自裁，年仅 47 岁。他的死，引得朝野物议鼎沸，私下里纷纷传说皇上免死狗烹，功高振主的年大将军成了牺牲品。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 39 年（1700 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任内阁学士，后擢四川巡抚。康熙 56 年（1717 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遣军割据西藏。四川提督康泰等官不能将兵御敌，年羹尧自请驻松藩办事督兵；授四川总督。康熙 59 年（1720 年），随平逆将军宗室延信入藏，以军功受皇帝赐弓箭，寻授川陕总督。康熙帝病危之际，谕召贝子、抚远大将军允禔回京，以年羹尧代管抚远大将军印务，主持西北用兵。

年羹尧的胞妹是雍正帝的贵妃。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时，为在诸皇子中夺得皇太子的地位，官至封疆大吏的年羹尧即为拉拢对象之一。年羹尧虽然久任在外，却经常与雍正书信往来，置康熙帝谕大臣不得私自结交皇子的禁令于不顾。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来信，胤禛就去信责怪年羹尧：“六七个月无一问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成陌生人矣”。年羹尧在川陕总督任上，随抚远大将军，十四阿哥允禔左右，多少起到了为胤禛通风报信、牵制政敌的作用。

年羹尧的发迹是在康熙帝在世的时候，他“实心用事”、“治事明敏”，用兵颇有韬略，故而十几年间，从词臣升任一品封疆大吏。雍正帝即位之后，朝中依靠的主要力量是“舅舅”隆科多，因为他掌握着京城卫戍部队两万人；地方上依靠的便是年羹尧。雍正帝让他统率着西北数十万雄兵，使政敌不得不有所忌惮。嗣皇帝登极之初，对年羹尧倍加恩赏重用，几乎到了炽烈颠狂的程度。首先命其接替允禔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寻实授。以后几年，年羹尧一直在西北前线为朝廷效力。叙平定西藏时运粮及守隘功，封三等公爵，世袭罔替，加太保衔，叙平郭罗克功，晋二等公；叙平青海功，进一等公，给一子爵令其子袭，外

加太傅衔。雍正 2 年（1724 年）8 月，年羹尧入觐时，御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辮及金币，恩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年的亲属倍受恩宠，连家仆也有通过保荐，官做到道员、副将者。皇帝对羹尧的奏章皆批“如所请”，甚至标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

就在年羹尧红得发紫的同时，雍正帝却偷偷开始收罗年羹尧的种种不法行迹，费尽心机地寻找治其于死地的借口。所以，后人多认为，与其说雍正帝是对年羹尧宠爱，不如说是纵容。雍正 3 年（1725 年）3 月，机会终于来了。是月，受年羹尧迫害的四川巡抚蔡珪跑到京城状告年羹尧，年羹尧也有劾蔡的奏章到京。皇上就此谕曰：“蔡珪系年羹尧参奏，若置之于法，人必谓朕听年羹尧之言杀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一改对年言听计从的态度。年羹尧保荐的庸才胡期恒（西安布政使）来京述职，皇上对胡评价说：“人甚卑鄙，奏对荒谬，岂特不胜巡抚，即道员亦属所玷”，下部议，革职。四月，上谕曰：“年羹尧曾妄举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是青海蒙古饥谨匿上不闻。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诛戮太过，致此昏愤。岂可仍居总督之任，念其尚能操兵丁，可补授杭州将军”。

雍正帝指责年羹尧变了，实际上翻脸的正是他自己。年羹尧素有喜怒无常，杀戮任性的脾气，受到雍正帝宠用后更加骄横。在西宁时，曾霸占了蒙古贝勒七信之女，还会军前斩杀提督、参将多人。雍正 2 年（1724 年）10 月，他进京面圣，出发时令直隶总督李维均、巡抚范时捷跪迎跪送。到京师后，王公大臣于郊外迎候，他旁若无人，傲然策马。在边疆时，蒙古王公见年羹尧必须先跪，额驸也不例外。雍正帝将这些都看在眼里，迟迟不加训诫，以待其走向反面。

年羹尧失宠的消息一传出去，爱好落井下石的人，交章弹劾。山西巡抚伊都立劾年羹尧私自占用国家税盐；都统范时捷劾

年羹尧捕盗滥杀无辜，并欺罔、贪婪五事。此时，年羹尧正在赴杭州将军任途中，接到圣旨，削太傅衔。到杭州不久，又被追回赏给的补服、黄带、花翎、紫辮等物。1月27日，革去杭州将军职，降为闲散章京，之后又连连落职。雍正帝还将发给年羹尧的朱批奏折追回，以掩饰当年同年羹尧的不平常关系。

在雍正帝的怂恿下，内阁、詹翰、九卿、科道合词奏言年羹尧的罪恶“罄竹难书”，于是部议尽革年的世职。雍正3年10月，命逮年羹尧来京严讯。12月，狱成。此距发端仅有九个多月。议政王大臣等定年羹尧罪：计有大逆之罪5，欺罔之罪9、僭越之罪16、狂悖之罪13、专擅之罪15、忌刻之罪6、残忍之罪4，共92款。从这些条款的内容来看，大半实有其事，未必出于罗织。如虚报军功、仪仗奢华，收取贿赂等很难说不是事实。但皇帝包容官员借权营私是清朝的“国策”，康熙帝就对大臣说过：“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这就等于告诉官员，占公家便宜是可以的。又说：“人当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来耶？”这就等于说谋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其实，雍正帝早就了解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甚至在一些批示词中令人怀疑他唯恐年不贪婪，不腐化。但转眼之间，这些行为全成了年羹尧的罪名。

雍正3年12月，皇帝差步兵统领阿尔图，来到关押年羹尧的囚室传旨说：“历观史书所载，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为守臣节。如尔公行不法，全无忌憚，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愿以尔实心报国，尽去猜疑，一心任用。尔乃作威作福，植党营私，辜恩负德，于心果忍为之乎？……，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宪典而服人心？今宽尔磔死，令尔自裁，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年羹尧接旨即自杀。此案祸及年家亲属及友人，其父年遐龄、兄年希尧夺官，其子年富立斩，诸子年十五以上者遣戍极边，子孙未满十五